

的模式，開始軍人獨裁與革命政權反覆交替的漫長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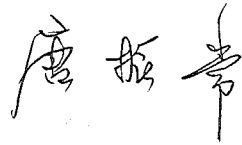
顯然，「光榮與財富」的追求可以產生許多不同文化因素，其中探索、冒險、征服、掠奪的氣質是最直接，也是西班牙人發展得最徹底的。他們因此創造了一個新時代，可是卻沒有能力接受和掌握由此而產生的下一個時代——以荷蘭的毛里斯親王、法國的笛卡爾、英國的培根、牛頓、洛克為標誌的十七世紀。這些新一代政治家、思想家所開拓的政治體系與科技文化雖然和實利的追求與分配仍然有深層關係，但其他重要的，西班牙人接受不了的基本理念，諸如真理、自由、民族權利等等，也逐漸在起決定性作用。現代文化是多元和多層累積的，哥倫布只能代表起點上一個方向的突破而已。

如今，中國文化正在急速蛻變：觀念上，對財富追求的傳統禁忌已逐漸「解咒」。也許，像許多人渴望的那樣，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因此正處於一次大爆發的前夕。然而，今天地球上也再沒有沉睡的新大陸等待新的「征服勇士」來臨。在不斷縮小的地球上，炎黃子孫究竟將如何為自己開拓另一個新空間，和以何種理念來建構下一個世紀的新文化呢？這是有待那些已感到了不可抗拒的強烈呼喚，那些「必須再到海上去」的人，來用心探究的。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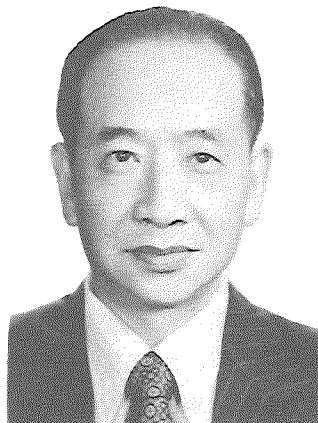
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昔年(1943-45)陳寅恪先生執教成都燕京大學時，曾集句為聯：「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其時寅恪先生病目，人以為心情之哀由此，聯語述其實情。

其實這不只是寅恪先生一人的實情與感懷。今日不知明日事之國人多矣。尤其在戰亂動蕩時期，遷徙流離，生活多失常規，更是如此。最近我在美國，去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訪舊友田汝康教授。田公告我：普林斯頓大學，多

有一家兩、三代人同出此校者。時有這樣情形：一家的嬰兒甫落地，父親或祖父即電告鎮上一家古老的小旅館，預訂二十年後的住房。說是某年某月某日，送這個孩子到大學入學，將住此。這種事，在我們中國人聽來，簡直近乎神話。二十年前能籌辦二十年後之事，足以說明美國社會的穩定。但是，我們中國人即使有這麼穩定的社會生活，我想，也不會為辦二十年後的這類事費心思的，除非是經營墓地。這是事情的另一面了，要從中西文化背景去探索才能有所了解。



至於寅恪先生「他生未卜此生休」之歎，則是老年人常有的感慨，似乎不足為怪。其時先生方五十餘歲，謂之曰老，今天看似覺太早，然於當時當地則未始不宜。王靜安先生遺書有句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人不以為異。然而，細讀寅恪先生詩文，從早年開始，即多哀傷之情，那就不能以老年人的感慨目之了。

先生哀傷者何？如從世俗眼光去看，三代名家，舉世同欽，先生更學貫中西，一代大師，似乎不應有凡人的煩惱與憂傷。竊以為，先生所傷者，正是他一生服膺的中國文化。先生之學，博大精深，我不敏，從先生學兩年，於先生之學無所窺，先生的學術思想，還是先生自己說的最為貼切，那就是：「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誠然這是先生自謙之詞，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為新瓶，自謙為馮書寫審查報告是以舊酒注入新瓶。但是，這個說法合乎先生一生學術思想實際。我們可以給先生貼上中體西用的標籤，卻不能不承認先生為一代大師，實「文化神州繫一身」之人。

這樣去理解寅恪先生，就可以了然先生對於王靜安先生自沉的哀傷逾恆之故。王靜安先生死後，寅恪先生曾寫五篇悼詩哀文書序之作，所有詩文，貫穿一個思想：王靜安先生是中國文化的代表，王先生之死，乃「神州文化喪一身」；王先生之死非殉清非殉一人，而是為文化殉身。如〈王觀堂先生輓詞·序〉所說：「凡一種文化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如〈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所指：「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此種說法，均具獨識，非切身有感不能發。先生這種觀點，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衍發為最具體的內容：「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所謂「獨立自由之意志」，先生在下文闡發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近乎攘臂高呼曰：「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

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遠在寅恪先生方壯年之時，已如是深切哀神州文化之喪，這種文化，亦為先生所肩，哀王，哀文化，哀自身，融為一體。1927年6月14日晚間，即王靜安先生自沉十二天之後，寅恪先生一生摯友與同道吳雨僧宓先生，與寅恪先生久談後，在《雨僧日記》中有如下記載：「寅恪謂凡一國文化喪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之寄托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靜安先生是其顯著之例。而宓則謂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範圍，惟有大小輕重之別耳。」後來儘管寅恪、雨僧二先生未曾以身殉，而所做所為實帶有殉道精神。「文革」慘遇，二先生所同，其實也是一種身殉。寅恪、雨僧二先生終其一生，所維護者，正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維護之而不可得，所以表現為「往往憔悴憂傷」。「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之聯語，不過一例耳。

寅恪先生所標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本應人人得而具之，事實上，恰恰又只具於少數人甚至極少數人之身。比年以來，談中國文化之作累累，於中國文化發展之試作方案者多矣，新儒家乎，融合中西乎，批判傳統乎，皆各有所見。無論中國文化如何發展變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終應是如柱之立。歲序輪移，世紀轉換，敢借此二語為祝為願。

唐振常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上海史誌學會會長

知識競賽的新世紀

胡為雷

當我們站在世紀之交的門檻，回顧二十世紀和展望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時，不能不在總結往事的基礎上粗略地預測一下未來。我認為新的世紀將是充滿挑戰、希望和機遇的時代，也必然是非常嚴酷的競爭和淘汰的時代。簡言之，二十一世紀必將是文明飛躍進步和各國知識分子全力賽跑的新世紀。

所謂「文明進步」或「文化進步」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科學和技術的迅猛發